



●陈思和 周明全 主编

“70后”批评家文丛·李丹梦卷

●李丹梦 著

○记得罗素曾说过：“研究一个哲学家的時候，正确的态度既不是尊崇也不是蔑视，而是应该有一种假设的同情，直到可能知道在他的理论里有些什么东西大概是可以相信的为止；唯有到了这个时候才可以重新采取批判的态度，这种批判的态度应该尽可能地类似于一个人放弃了他所一直坚持的意见之后的那种精神。”这话可说是对批评精神的最好诠释了。真正的批评是从其作为对象的文本里生长出来的，虽然两者表达的方式可能迥异，但内里的精神就像一个人的自省、忏悔和对美好人性的希冀。痛切批判的同时，亦在深刻地自我检视和憧憬。批评的美妙体验正在于此，它实践了生活中理解的纯粹。

◎陈思和 周明全 主编

“70后”批评家文丛·李丹梦卷

●李丹梦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70后”批评家文丛, 李丹梦卷 / 李丹梦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222-14775-1

I. ①7…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34981号

出品人: 刘大伟

项目策划: 周明全

责任编辑: 姚实名 李 爽

装帧设计: 胡元青

责任校对: 徐 霞

责任印制: 洪中丽

“70后”批评家文丛·李丹梦卷

李丹梦 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ynrms@sina.com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8.25

字数 250千

版次 2016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中国石化集团滇黔桂石油勘探局昆明印刷厂

书号 ISBN 978-7-222-14775-1

定价 35.00元



如有图书质量及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 0871-64164626 印制科电话: 0871-64191534

云南人民出版社公众微信号

编者说明

2012年5月，第二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颁布，因为获奖者中“80后”批评家的缺席，引起了媒体的普遍关注。《文学报》《文汇报》《文艺报》等主流媒体纷纷发文探讨这一现象。过了一年，2013年底，云南人民出版社策划了“80后”批评家文丛第一辑，隆重推出了杨庆祥、金理、黄平、何同彬、傅逸尘、刘涛、徐刚、周明全八位青年批评家的文集。文丛出版以来，在批评界获得很多好评，被认为是“80后”批评家首次集中亮相。2015年，我们又推出“80后”批评家文丛第二辑，收录了李德南、项静、康凌三位青年批评家的文集。同时，从2014年开始，每年选编一本《“80后”批评家年选》。“80后”批评家书系的陆续出版，为青年批评家的成长创造了一个“话语场”，使得这个在几年前还处于潜隐状态的文学群体快速地浮现于文学现场的前沿。

在“80后”批评家文丛得到业内普遍认可时，云南人民出版社顺势而为，继续策划“70后”批评家文丛，第一辑推出了谢有顺、梁鸿、张莉、霍俊明、李云雷、房伟、刘志荣、李丹梦八位“70后”批评家的文集。相较于还在成长中的“80后”批评家，“70后”批评家已经是成绩斐然的一代。但整体上，“70后”批评家在当代批评界属于“被遮蔽的一代”。有人认为这种被“遮蔽”状态，和“70后”批评家的成长经历有关，也和文学发展的客观状况有关。对他们来说，20世纪80年代是漫长、稳定、天真而美好的“童年”，90年代之后才逐渐进入真正的成长期，但那时的社会环境不一样了，新的状况层出不穷，有疲于奔命之感——但真正接触社会、进入文学，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现在想起来，90年代以来社会上发生的种种大改革、大变动，“70后”都遭遇了。这一代批评家基本上是在学院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学院里逼仄的生存空间和过于具体、量化的升等制度，以及90年代普遍压抑

的客观环境，都在他们的学术性格里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文学上也是这样，90年代，赶上文学的边缘化和低潮期，然后是进入新世纪，网络文学和流行文学的大潮呼啸而来——文学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文学，一切都在除陈布新的转换过程中，大量的新现象新问题都需要批评家自己去辨别和摸索，如80年代批评群体的亮相活动就相对减少，环境晦暗而复杂得多。因此，除了个别批评家出类拔萃、成名较早以外，大多数的青年学者兼批评家，都是经过了漫长的学习时期和适应时期，才慢慢地开始崭露头角，他们没有形成一个批评的群体，再正常不过。

云南人民出版社将“70后”批评家中的优秀者集结起来，其目的就是以丛书的形式，确立这代批评家在当代批评中的身份和位置。或者准确地说，“70后”批评家已经具有清晰的身份表示，云南人民出版社只是将这代人中最为优秀的才俊集体展示出来，以供世人进一步了解他们。当然“70后”批评家中的佼佼者并非只此八位，还有大量优秀批评家的成果，将在我们第二批、第三批的丛书中逐步推出。同时，计划从今年起，每年选编一本《“70后”批评家年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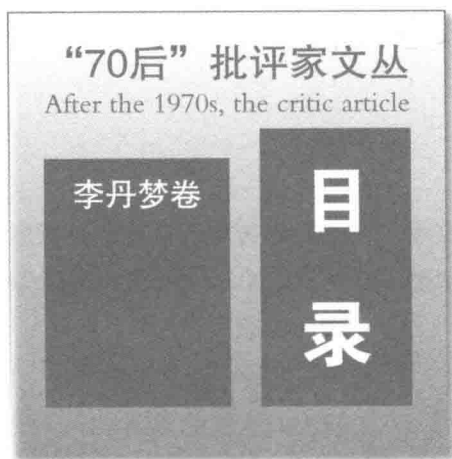
推出在全省、在全国、在全世界都有代表性、有特色的文学艺术作品，是云南人民出版社一贯追求的目标。在多媒体出版的今天，无论图书的形态如何变化创新，一个出版社是否担当了文化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就是在这个追求过程中点点滴滴地具体体现出来的。云南人民出版社将始终肩挑这份责任，为文艺的繁荣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

在文学新人的培养方面，云南人民出版社也有着长期的坚持，20世纪90年代策划出版的“博士思想文丛”，曾经产生过很大影响。当年也是文学批评新人的旷新年、陈晓明、孟繁华、程光炜等等，就是踏着“博士思想文丛”之路，逐渐在文坛崭露头角，现今已经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中坚力量。当年的“博士思想文丛”的作者，现在有许多人已经担任了“80后”批评家文丛作者的导师。文学的薪火就是这样代代相传的。当然，批评家的成长，非一套丛书、非一家出版社所能为之，期望“70后”批评家文丛能取得抛砖引玉之效。若此套“70后”批评家文丛能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由此生发出更多的关注“70后”批评家成长的善举，那么，此亦为

批评界的一大盛业。

此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著名批评家陈思和先生的鼎力支持。陈思和先生是当代批评家中比较自觉地将教学、写作、出版结合为一体并能够付之于实践的知识分子。本社出版的两套批评家丛书能得到他的支持，乃是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光荣。同时，文丛获云南省文艺精品扶持资金资助，在此，我们对为文丛出版提供帮助和支持的所有人表达诚挚的谢意。

2016年7月8日



上编：当代文学的“立场”

文学的现实态度

——聚焦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 // 003

“非虚构”之“非” // 028

文学的生态抉择

——论红柯 // 040

在成长与现实、历史之间

——论张学东 // 052

对语言的生存性契入与思考：词的意识流

——论臧棣的诗 // 061

中编：中原文化与“中原突破”

文学“乡土”的地方精神

——以“中原突破”为例 // 073

文学“乡土”的苦难话语与地方意志

——以“文学豫军”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创作为中心 // 110

现代中原“化石”

——论乔典运 // 135

权力与人性的角逐

——论刘震云 // 160

极端化写作的命运

——论阎连科 // 193

下编：女作家评论小辑

论迟子建的个体哲学

——透视其中短篇小说 // 213

卑贱·匮乏的隐喻

——论林白 // 225

张悦然的“文学性” // 248

浪漫的陷落与挣扎

——论棉棉的《糖》及其他 // 255

文学“返乡”之路

——论魏微 // 269

· 上编 ·

当代文学的“立场”

文学的现实态度

——聚焦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

一、权力与公正

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已尘埃落定。其间虽采用了实名投票、引入公证等革新方式，但依旧落下不少话题是非。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标准问题。提问的典型格式如下：鲁奖是谁的？究竟是以专家评审的精英口味为准，还是该寻求更多的大众支持？二是对评奖程序规则的质疑。譬如，实名制投票是否干扰压抑了评委的个人意志，以所谓透明、集体、公正的名义？

上述问题，实无定解。这种评判走向颇似金庸笔下独孤九剑的路数：但凡对手出招，必随现破绽。只需剑挑破绽，自可立于不败之地。笔者并非为鲁奖辩驳，作为国家性的文学奖项，鲁奖的实行本就是各方斟酌妥协的结果。作品题材、作家地域、年龄等方面的平衡考量，便是一例，由此不难觉出国家奖项的“全面关照”与“综合公正”。早有论者指出：鲁奖乃是受控于国家权力的奖项。从制度层面看，它不啻为“自我评选、自行分配利益的奖项”^①。观点虽不失精辟深刻，但也“一剑封喉”了继续探讨的可能。

把评奖视作权力的运作，跟目下时评中把大部分文化现象归咎于资本的特性一样，实是简省化约、“正确”精深的文化思维，但未免用得过滥了。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去历史化。其实无论集权或资本，都非一成不变的概念，更找不到与之对应的固态实体。就学术探讨来说，与其上来便自陷

^①吴俊：《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制度性之辨》，载《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6期。

于概念的框架体系，不如把国家、集权之类视为鲁奖事件发生的条件之一，以平和开放的心态来检视事件的发展历程，这或许会带来新的思想契机。

我们发现，国家集权是组织者与干预者，却不能全盘操控鲁奖。它有所顾忌！在国家单向控制力的实质性减弱里，能感受历史的动向或“进步”。本文以“文学的现实态度”为题，即想梳理这种综合的关联与变化，还原以鲁奖为核心的文学历史现场。它包括两方面：一是评奖规则层面折射出的现实应对策略，二是获奖文本中呈现的主体^①的现实态度，这在当下文学中不无普适的意义与参照。为避免论述过于宽泛，我们将笔触聚焦于鲁奖的一个重头戏：中篇小说。

第六届鲁奖共评出五部中篇：格非的《隐身衣》、滕肖澜的《美丽的日子》、吕新的《白杨木的春天》、胡学文的《从正午开始的黄昏》与王跃文的《漫水》。五位作者中除滕肖澜是20世纪70年代生（1976）外，其余均为“60后”（王跃文1962，吕新1963，格非1964，胡学文1967）。就年龄而言，这体现了鲁奖一贯对中青年作家倚重提携的传统^②，由此传递出文坛稳中求进、欣欣向荣的讯息。

五位作者在创作界系公认的实力派：格非、吕新在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运动中就已成名，王跃文的官场小说，胡学文的底层文学，滕肖澜的上海故事，也各具特色。就此而言，他们的获奖并不属黑马式的例外。鲁奖的颁发，在相当程度上是对文坛既定格局、等第，尤其是对创作界极

①本文言及的主体，与作者密切相关，但并不完全等同。它是作者在作品里不断追认的希望与之趋同的形象感召，系作者、叙述人与作品人物交织互动后得出的一个“我”之印象。

②笔者做了一个统计，就中篇小说来看，鲁奖获奖者的年龄段集中于35~55岁之间，最大的62岁（林希，第一届鲁奖），最小的31岁（田耳，第四届鲁奖；东西，第一届鲁奖）。另外，从平均年龄上考察，第六届鲁奖中篇获奖者的平均年龄是46岁，第五届44岁，第四届42岁，第三届46岁，第二届44岁，第一届44岁。

具声望的核心文学期刊之审美趣味及判断的肯定与公认仪式^①，不无顺应人心、顺水推舟之意。让人忧虑的专家口味，实际把控相当有限。

作为鲁奖最直接主动的一个环节——评委，我相信他们内心都有种担心：自己挑选的作品不能太豁边离谱。与其说压力来自某个明确的集权，不如说是公正意识本身的焦灼。对自己选出的作品，创作界怎么看？同行怎么说？媒体如何评论？百姓反应如何？此系对奖项“公信力”与“服众性”的预判或构想，而评选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服务于这一预判。就此而言，鲁奖注定绝少真正的黑马。这并非文学界的独有现象，整个社会大体如此。中国向来尊古崇老，讲求名正言顺，此种传统思维很难断除，从历届鲁奖获奖者年龄中亦能感觉到这种思维的惯性。

但凡鲁奖获奖作品，给人的印象以平和中正居多。这话绝无贬义，笔者认为它恰是当下文学状态的真实写照。我们一直被所谓“和”的精神笼罩困扰着，这从20世纪90年代文学地位旁落就已开始。“和”的初衷，旨在圆满解决文学与大众的关系，把文学从政治的掌控中还给大众。这恐怕也是中国文学在和平年代的“现代”追求吧？前文所说的公正，也包含在“和”的逻辑理念中。简单说，“公”即是“众”；找到了“众”，便是“和”。文学要摆脱边缘的窘境，必须处理好与“众”的关系，作为媒介事件的鲁奖，对此更不待言。相比具体的集权，“众”的压迫在目下中国的语境中尤具威慑力。

某种程度上，可以把鲁奖的评选纳入到中国正在摸索尝试的民主事业来加以考察：如何让选出的作品符合“民”意？一般说来，民主意味着对个体、个性的平等对待与尊重，但在实践中却常常与“众”的概念混淆起来。“众”的基础是多数，并由此辐射到世俗理性、人情常理、实用价

^①仍以中篇小说为例，截至2014年，六届鲁奖共评出33篇作品。其中，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有9篇（占27%），《收获》5篇（占15%），《十月》4篇（占12%），《钟山》3篇（占9%），《北京文学》2篇（占6%），《大家》2篇（占6%）。发表在以上杂志的篇目共计25篇，占据了全部鲁奖中篇的75%。其他杂志，如《当代》《上海文学》等，各有一篇。本届鲁奖的五部中篇出自《人民文学》《收获》《十月》《钟山》和《湖南文学》。

值等，或可用海德格尔的“常人”（das Man）^①状态来称呼它。从服众的角度看，把核心文学期刊与作者的名声当作重要的参照，不失为稳妥务实的选择。

“众”的绑缚不仅体现在评奖程序中，亦在创作精神与审美取向里表露出来。连续两届鲁奖在诗歌奖上均爆争议（“羊羔体”与“嘍天诗”），原因有多种，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对大众口味与世俗精神的评价分歧。以王蒙对周嘍天诗作的点评为例：“这里有一种平常心，写平常事，而平常人平常诗中出现了趣味，出现了善良，出现了生机，出现了至乐至公至和，在充满戾气的现代世界上，这实在是难得的和谐之音。”^②一面是普通读者的发懵气闷，一面却是名家的称道赞赏。后者对于“众”的文学趣味，其理解或预判是否太低了点？

纵观鲁奖历届中篇小说，甚少有思想震撼之作。它们的叙述技巧已足够圆熟，语言上较之现代文学史上的前辈作家也“进步”多了，但思想却巡行在常人的维度。这里有的是细腻温煦，亦不乏机智博学；慨叹是忧伤的，针砭是委婉的。跟评奖层面的现实应对相似，它们预设了一个常人式的理想读者，理解、投契、和睦是主调。就此而言，鲁奖获奖作品与鲁迅精神之间，实有不小的参差。套用李泽厚的话：这是个思想家淡出、作家凸显的年代。

所谓思想家，并非意味着拥有了某个具体先进的理念，它指向一种建立在真切的怀疑省思上的内里褶皱与深度。但目下的中国作家却极少在意这种内部修为与经营。他们只是构思、叙事。小说一篇篇地被策动生产出来，乍看千姿百态，但其间透出的主体人格状态却仍是“那一个”，罕见成长与变化，更不用说对日常理念或世俗理性的冲击、升华了。本届鲁奖中篇亦存在这个问题，其间折射的现实态度让人深思。

① “das Man”是海德格尔生造的一个词，他把德语中的不定人称代词“man”大写并加上中性定冠词“das”，以此合成词来指陈那些处在一般日常状态中的人，亦即丧失了“向来我属性”的此在。

② 吴亚顺：《妙赏新科鲁奖诗人周嘍天的“新闻诗”》，载《新京报》2014年8月12日。

二、先锋的“转型”：“隐身衣”

文学切入现实的态度，涉及跟外在社会的物质较真与比对，但绝不仅限于此。事实上，这基本是个文学世界观或“前想象”范畴的问题。任何作者在进入具体的创作之前，首要应对和确立的不是语言或技巧，而是主体的自我定位。它涉及三方面：主体形象、主体与世界（包括虚构世界及周遭的现实、读者）的关联、主体与自身的关系。这三者是彼此渗透粘连的，个我的形象需在与世界的关联中体现出来，而与世界的关联说到底是与自身的关联，我们很难在作者笔下的世界与其自身之间做明确的分野，就像张炜在回答“为谁写作”的提问时所说的：“我是在为遥远的‘我’写作，写作时总觉得在很高很远的地方另一个‘我’在看着我，我的写作要让那另一个‘我’满意。”^①对此，格非讲得更明晰：写作就是一个发现读者与自我的过程。“一个作家采取怎样的叙事姿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她）对自己读者的想象与设定。”^②“写作中的读者都是虚设的，它是一个开放的结构。我的虚设读者首先是我自己。”^③

在这个意义上，《隐身衣》^④的出现，不啻为主体态度的宣喻或表征。所谓“隐身”，其字面亦是核心的意思，指向一个不易被觉察的、安全和平的观察位置。这在小说主人公兼叙述人、一个胆机制造者“我”（小崔）身上得到了应验。小崔的客户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他们在小崔面前高谈阔论毫无顾忌，当他几乎不存在，一个实际功能上的“隐身者”。小崔由之见识了人性本色。这种低微隐没的自我感知轨仪，亦扩展到小崔的全部生活中。他就像个被拨来拨去、不晓得疼痛的棋子或橡皮。前妻玉芬以跟单位主任“好上了”为由，大大方方向他提出离婚；姐姐为了让离婚的他尽早搬家，竟给他介绍了一个患有癌症的女友……

①张炜：《午夜来獾》，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270页。

②格非：《文学在读者中寻求认同》，载《文艺报》2014年10月10日。

③余中华、格非：《我也是这样一个冥想者——格非访谈录》，载《小说评论》2008年第6期。

④格非：《隐身衣》，载《收获》2012年第3期。

上述细节倘若流到写作《敌人》（1990）时期的格非笔下，画面不知会怎样残酷阴冷，但《隐身衣》的基调却是温情幽默的。结尾处姐姐终于收到弟弟小崔的电话，后者搬家后已失联一年。话筒里的姐姐直哭，“让我什么都别说，马上回家。她要给我包一顿茴香馅儿的饺子。仿佛她这辈子，就欠我一顿茴香馅儿的饺子”。这里存在着类似创作“转型”的新质，尤其是那温文尔雅、平和节制、不无软弱的语调态度，很惹人眼目。它不仅是人物（小崔）性格的体现，更是叙述的自觉与策略，隶属主体认同与构建的范畴。我以为《隐身衣》的获奖，有一半要归功于这种姿态的魅惑。那是种既时尚现代又舒服愉悦的感觉，先锋书写与读者的紧张关系不复存在。

以对悬念存而不决的处理为例：蒋颂平和姐姐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盘龙谷里的女人为什么被毁容，她跟丁采臣又有何瓜葛？小说均未给出答案。空白跳跃的技巧、神秘莫测的格调，让人想到早年的格非，但并未造成理解的隔阂。相反，它们拉近了我们与主体的距离。这仿佛是个绅士写的故事：在不予解答的空白运用里，你能觉察他对个体隐私的尊重，绝不步步紧逼；而悬念的设置，则是他迷人的寒暄。真可谓叙述得体、进退合宜了。

这样的“人”（主体）连同其作品，实在让人难以拒绝。尽管他最终也没给出什么深邃、新鲜的思想——诸如“事若求全何所乐”，“肮脏、平庸的世界上，运气是唯一的宗教”等，都是些尽人皆知、老实实用的生存智慧，却自有一套波澜幽深、知识缭绕的形式——《隐身衣》里遍布的音乐常识着实触目——它已足够吸引人了。这恐怕也是文学“与时俱进”的体现：别以为自己比读者高，不要载道教训启蒙，更勿挑衅生存至上的硬道理。我们只需把一个人之常情的道理讲得玲珑别致即可。

对他人宽大，亦是对自己慈悲。在小崔息事宁人的处事应对里，能体悟到平等糊涂、自我慈悲的主体哲学。格非曾说：“假如作者一定要代表什么人的话，我愿意代表的，或许仅仅是失败者而已……文学原本就是失败者的事业。”^①这可能就是触发格非在讲述小崔故事时采取第一人称的

①格非：《我愿意代表失败者》，载《文艺报》2011年11月14日。

内在动因？失败的精神体验让他们结成了一体联盟的“我”。整部《隐身衣》看不出任何超越或升华的倾向，刚从“江南三部曲”沉重磨人的乌托邦追溯与破灭中走出的格非，在此来了个漂亮的“软着陆”。历史上“花家舍”式的乌托邦被用以移（怡）情的、既当下物质又流动飘逸的音乐所取代。与之匹配的是那奇妙混合的主体精神状态：疲惫与噱头，委顿与调侃，寡合茫然与知识趣味。它们互为表里，彼此成就。

本来，像小崔那样被人漠视又不善言辞的活生生的“隐身人”，是很可以作为描述世界的“镜子”来对待和运用的。《隐身衣》全篇基本以小崔的视角展开铺叙，这加大了我们对他系“镜子”角色的预期。格非一再强调自己的写作源于自身与现实之间难以沟通的困境，在对小崔平民身份的认同（第一人称“我”是认同最显在的标记）以及隐身 / 镜子的设置中，能感觉到主体企图融入社会、把握现实的倾向。此间折射出主体对个体生命的普遍关注与同情。这也许是作者从自身生存困境中耸身而出的一个“豁口”或路径：用建立在人情通达与日常品鉴上的交流和谐，来取代先锋实验中主观冥想的独语？

然而，小崔“镜子”的潜质并未把小说引向客观探究的叙述轨道。仅以人物本身来说，它的真实性就颇可质疑。小崔的平民身份与文绉绉的温雅趣味的“格非腔”并不吻合。有读者说，《隐身衣》的叙述带有“贵族气”，用词虽不尽准确，却点到了要害。这表明，作者与小崔间的“我”之认同与联盟，其实是大打折扣的。它更像叙述的权宜之计：借着小崔的身份外衣来倾吐在世的失败体验及对自我那虚弱又同情的不满……

我们在小崔跟他的客户，某个大学教授的交往中可体会到上述微妙的情绪。小崔一面讨厌教授的夸夸其谈自以为是，一面又要尽心为他们服务。这种态度让人想到在大学任教的格非，似乎带有温和自审的味道。直到作品结尾，小崔才鼓足勇气对教授说：“如果你能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实生活还是他妈的挺美好的。”显然，这不仅是小崔的人生哲学，亦是《隐身衣》中主体的精神旨归。与其说《隐身衣》写了一个小人物的故事，不如说曲折展现了时下知识分子犬儒虚脱的心灵症候。对于弥漫的常人意志，他们的态度是不反抗的清醒，不拒绝的理解，不认同的接